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垦荒移民

赵入坤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垦荒移民; 计划经济; 人口流动

[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垦荒移民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人口流动的一种具体表现。其动因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其一, 灾民安置、城市失业治理的应急需求; 其二,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缓解; 其三, 解决农业的落后现状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矛盾; 其四, 实现军队复员转型与边疆安全的统筹考量。因此, 垦荒移民也是当时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虽然自发的垦荒移民在当时确实存在, 但是集体有组织的垦荒移民规模更大。国家通过行政体系实现了集体垦荒移民的有序化管理。当然, 在移民组织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诸如, 集体移民的返迁问题、移民工作中出现的浪费问题、移民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移民与移入地原居民关系紧张问题等。不过, 这只是局部性的工作失误, 并非全局性的政策性错误。总的来看, 垦荒移民对我国扩大耕地面积、加快边远落后地区开发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25)03-0051-14

DOI:10.16095/j.cnki.cn32-1833/c.2025.03.006

一般认为,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而规模不大。实际上, 这是一种误解。其时中国人口的流动并非微不足道。因种种原因而起的人口流迁形式多种多样, 垦荒移民就是其中之一。它在当时是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 有着相当大的规模。目前, 学术界对中国垦荒移民的研究明显不足, 尚有许多问题等待澄清。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的垦荒移民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轮廓, 也有助于准确把握人口流动的历史规律。

一、垦荒移民的背景与发展

移民有悠久的历史。移民的类型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而形式各异。垦荒移民, 指

[收稿日期] 2024-05-19

[作者简介] 赵入坤, 男, 安徽和县人,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由国家或集体主导,以开垦闲置或边缘土地为核心目标的人口迁移活动,兼具经济开发与社会治理双重属性。垦荒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农业经营,荒地也主要存在于农村。因此,以移民的地域分布为标准来衡量,垦荒移民属于农村移民。此类移民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地方因受灾过重而丧失了生产条件,对于这类地区的灾民,政府采取了迁移安置的办法。如河北省自1949年11月19日至12月28日,先后八批共移出14 642人。平原省在1950年春共移出12 855人。这两省的移民都安置到黑龙江的嫩江、甘南、海伦、德都、庆安等县,松江省的延寿、桦南、集贤、密山等县。此外,从河北省移民到察哈尔省北部的还有3 700人。这些地方土质肥沃,物产丰富。政府为移民提供了贷款、粮食及一些垦荒必需的农具,基本上解决了移民生产初期的实际困难^{〔1〕}。这种前往农村的移民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里就有相当数量。据统计,1950—1954年全国城市返乡务农人员累计达145 714人^{〔2〕}。1955年6月以后,垦荒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据农业部对黑龙江等15省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55年11月底,包括省内省外移民在内,有组织的移民共162 019人,垦荒461 300公顷。作为移民重点的黑龙江省共移民94 919人,为此开荒172万多亩。这些移民除尽量安置在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建立了42个移民新村。辽宁移民16 116人,北京向甘肃移民6 205人,福建沿海地区向山区移民2 268人。浙江、内蒙古、湖南、湖北、热河、甘肃等省均进行了少量的移民开荒^{〔3〕}。

1956年国家组织了大规模集体垦荒移民。一些地方政府相继组织劳动力富余的农村人口到边远地区集体垦荒,动员城镇失业、无业人员下乡插社或去农场开荒生产。这样的垦荒移民分为省际移民和省内移民两种。截至1956年7月的统计,省际移民有308 399人。省内移民,据广东、福建等15个省的统计,有270 959人^{〔4〕}。这次大规模集体移民结束时,据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六市二省的统计,这种移民连同家属共有86万人^{〔5〕}。

1950年代的垦荒移民基本上属于集体移民。集体移民的规模一般较大。黑龙江省从1955年开始大规模接受外省集体移民,当年接受山东省集体移民17 648户,180 165人。1957年和1958年又分别接受山东集体移民10 715户、40 187人和10 421户、54 200人,另接受原移民家属4811户,19 473人。据统计,仅山东集体移民就占了1952年至1958年黑龙江接受外省移民总数的89%^{〔6〕}。

〔1〕 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2〕 武力、郑有贵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1921—2013)》,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

〔3〕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439页。

〔4〕 《内务部关于移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6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53—2—1311。

〔5〕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6〕 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77页。

涉及几十万人的集体移民除共青团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1956 年政府组织的集体垦荒外,还有“大跃进”期间的支边移民。根据 1958 年中共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决定,中央农垦部和有关省、自治区党委及政府共同组织了这次大规模移民。据统计,从 1959 年至 1961 年,共迁移青壮年 93 万余人,家属 43 万余人,加上退伍兵约 7 万人,家属约 5 万人,共 148 万余人。支边集体移民的 70%安置在国营农场和农村人民公社。他们在几年内新建扩建了 260 多个国营农牧场,开垦了大片荒地,增产了粮食,发展了橡胶种植产业^{〔1〕}。

垦荒自发移民在 195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是当时农村自发人口流动的一部分。对于农村人口的自发流动,政府当时的政策基本上是予以限制的^{〔2〕},但对流往边疆及农村地区的则例外。1959 年 2 月 7 日,中央批转了内务部党组《关于农村人口外流问题的报告》,指出对于流到边疆去的人口,一般不要动员他们还乡,应该由有关的省区协作,把流动去的人口的来历、政治情况弄清楚,以便合理分别安置^{〔3〕}。

从农村流出的人口尽管也有进入城市的,但随着国家控制城市人口力度的加强,流往边疆和其他农村地区就成为能够合法地实现移民愿望的唯一途径。1956 年秋,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等省流入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的农民有 8 万余人^{〔4〕}。1957 年夏收之前对部分农民流入地的统计人数就达 57 万多人。

垦荒移民的流向一般是从人多地少的农村流往地广人稀之处,或者是从东部大中城市迁移到农村。从地域上讲,东北、西北边疆省区,中部江西、湖北等革命老区是垦荒移民流入地。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山东、河南、河北等省是垦荒移民主要流出地。安徽、山西、陕西等省也流出部分垦荒移民。

垦荒移民贯穿 20 世纪 50 年代,不同时间段因各种具体原因而兴起的移民的人口构成并不相同。移民人口构成包括以年龄、性别为主要内容的自然构成和以文化教育状况、职业状况等为主的社会构成。

黑龙江省在 1952—1957 年共接受省际农业集体移民 48 858 户,306 083 人,其中来自山东的最多,共 38 448 户,265 271 人。1956 年省际农业集体移民中青壮年占 54%,老年和幼年占 46%。全家移民的占 46%,单身汉占 54%。在单身汉中,大多数是以青年垦荒队名义入疆,其政治素质比较强,但性别比失调,男多女少,轻者为 3:1,重者为 10:1^{〔5〕}。

〔1〕《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2 年 10 月,江苏省档案馆,3011—2—809。

〔2〕赵入坤:《人民公社初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管理》,《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6 期。

〔3〕《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17 页。

〔4〕《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27 页。

〔5〕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00—202 页。

天津市 1956 年垦荒移民的情况也大致类似。该市 2213 户垦荒移民有汉族 9515 人,回族 870 人,其他民族 22 人;文化程度:小学 1135 人,初中 147 人,高中以上 19 人;性别方面,有男性 5648 人,女性 4759 人,性别构成似乎正常。实际上,在 18 至 60 岁的成年人中有男性 2637 人,女性 1964 人,性别构成不平衡的情况也相当突出〔1〕。

这种情况在支边移民时就有了明显改善。政府组织支边集体移民的基本方针是坚持自愿原则,成员主要是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家庭拖累不大的青年,也有一些有生产经验的壮年劳动者,要求男女人数大体相当,各行各业人员要求适当配套,除了大部分是农民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及商业、教育、卫生和各种服务业人员,并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和党团员〔2〕。按照这样的要求,江苏省 1960 年进疆青壮年中,青年占 68.47%,壮年占 31.53%,夫妻共同进疆的 24 144 人,全家都支边的有 7000 多户。未婚女占未婚男女总数的 48.7%。进疆青壮年中党员占 2.26%,团员 4.92%,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进疆青壮年中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上的占 54.75%,其中有初中程度的 1534 人,达到高中、大学程度的 143 人,还有一些略有技术的人员,包括铁、木、竹、瓦等手工匠人,稍懂厂矿技术者及理发、缝纫等服务性行业人员,共 2456 人,各种技术及教学师资的培训对象 2416 人〔3〕。

二、垦荒移民的原因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垦荒移民的原因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 灾民安置和城市失业治理的双重压力

我国地域辽阔,水旱灾害频发。新中国成立初的头十七年中,全国受灾面积最大的是 1960 年,达 6.5 亿余公顷,受灾面积最小的 1952 年也达 8000 多万公顷。其他年份由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受灾面积基本在 2—3 亿公顷。成灾面积的比重最高的达到 68.6%,最少的也达到 25%〔4〕。因灾害造成的灾民数量惊人。据统计,全国灾民在 1949 年有 4 000 万,1950 年有 3300 万,1951 年有 3000 万,1952 年有 2700 万,1953 年有 3400 余万人〔5〕。对于受灾地区,国家都予以全力救助,其方法之一就是帮助灾民到地多人少或有大量荒地的地区安家落户,从事生产。1949 年政府就帮助 4 万多灾民移民到东北、西北等地区进行垦荒〔6〕。黑龙江省 1955—1957 年三年间共安置外省自发流入灾民 248 869 人,仅龙江、德都、宁安等县 1958 年就安置自发流入灾民 5200 余户,

〔1〕《移民情况统计》,天津市档案馆,53—2—1311。

〔2〕《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1958 年 8 月,江苏省档案馆,3086—1—1。

〔3〕《关于 1960 年支边动员迁送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江苏省档案馆,3086—2—10。

〔4〕《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5 页。

〔5〕《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 22 页。

〔6〕《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52 页。

计 26 000 多人,其中多系从山东省流入〔1〕。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上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失业人员 42.3 万人。江苏全省城市失业人员有 72 万多人。新中国致力于实现保障就业的劳动政策。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2〕。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解决失业问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51 年 12 月有 120 余万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其中国营工矿企业吸收约 60 万人〔3〕。尽管如此,失业问题依然严峻。1952 年底,全国 146 个大中城市和县镇统一登记的失业总数为 162 万多人。这其中求职登记的 43 万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妇女。登记的 77 万多失业工人中大部分有劳动能力而缺乏技术文化。失业知识分子有 10 万余人,失业的小工商业主、行商、摊贩等也有 10 万余人,旧军官旧官吏有 34 000 多人,僧尼道士 5000 多人〔4〕。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在土地改革完成后也逐步显现出来。为解决城乡充分就业问题,1952 年 8 月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其基本思路之一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移民,在不破坏水土保持及不妨害畜牧业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垦荒,扩大耕地面积”〔5〕。

(二)教育扩张与就业结构的矛盾

1949 年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规模增长很快。1949 年全国只有小学生 2 400 多万人,中等学校学生 126 万人,高等学校学生 11 万多人。到 1957 年,全国有小学生 6 300 多万,中等学校学生约 597 万,高等学校学生 40 万以上〔6〕。由于不同等级教育规模差距巨大,因而,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十分突出。1954 年前后的经济、教育紧缩在城市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未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1955 年仅北京、天津、上海三市不能升学的中小學生就有 6 万人,加上历年未能升学就业的为数更多,仅上海一地待业的青年就有 30 万人。

知识青年安置就业问题倒逼移民垦荒成为政策选项。鉴于城市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压力,并受中共中央批转农村工作部垦荒移民意见的启发,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认为这

〔1〕 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77 页。

〔2〕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71 页。

〔3〕 袁伦渠:《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5 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9—30 页。

〔5〕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2 年)》,法律出版社,1955 年版,第 217—218 页。

〔6〕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8 日。

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1〕。这一建议迅速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团中央在此后的两年内主要靠青年和社会各界的捐助及集资而不是靠国家拨款组织了青年垦荒运动。其成员都是单身青年男女。青年志愿垦荒成为 1950 年代不多的大规模集体垦荒移民之一。

(三)解决农业的落后现状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矛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供应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也决定着经济建设的规模。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尽管 1953 年国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平衡,但是由于我国的耕地不足,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状态始终存在。因而,发展农业生产,增产粮食,是当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当时条件下“增加农业生产的根本途径”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垦荒以扩大耕地面积。1955 年 5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指出内地向东北、西北的移民历来就有,近几年来也未停止。适当加以组织,数量将更多。为此,建议政府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有可开垦荒地的边疆地区组织内地移民垦荒〔2〕。

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规划中。“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将扩大耕地面积 3868 万亩(约合 2 578 666 公顷——笔者注)”。国家要“适当地增加农业的投资,开垦更多的荒地”〔3〕。李富春在国家“一五”计划的说明中强调,在“一五”计划期间“应该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完成一亿亩以上荒地的勘察工作,至少完成 4000 万亩到 5000 万亩荒地开垦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做好准备”〔4〕。根据“一五”计划的规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意见被批准,当年就有 18 个省市上报了移民垦荒的计划。

(四)军队转型与边疆安全的统筹考量

随着国内和平的实现,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了日程。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为制约国家财政投入经济建设规模的主要因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军队整编,把一部分师团成建制地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1952 年 2 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5〕。实际上,作战部队转为屯垦部队开始得更

〔1〕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4 页。

〔2〕 《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1955 年 5 月,江苏省档案馆,3001—2—16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87 页。

〔4〕 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25 页。

〔5〕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24 页。

早。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新疆。由于边疆地区的穷困、路途的遥远及交通的落后,部队的给养供应极为困难。朱德在当时给王震的信中指出,军队“如不提倡生产,将不能生存,更不能维持秩序”,强调“今后你们以生产为保持军队生活,明春即发动是最重要的事”〔1〕。有鉴于此,1950年1月新疆军区发布了大生产的命令,抽出一半以上的军队屯垦〔2〕。

在中央要求军队集体转业命令发布后,1953年3月新疆军区奉命成立生产管理部,负责组织部队生产。整编后的生产部队有15万人。鉴于巩固边防的需要和生产部队“不愿一下子脱离军队性质的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也可能引起部队的思想波动”,新疆生产部队并没有“采用完全脱离军事性质的名称”,而是定名为生产建设兵团〔3〕。1954年8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下辖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工程师和1个运输处,总人口17.5万人,其中职工10.5万人〔4〕。尽管生产建设兵团所属成员此时才正式成为扎根边疆的移民,但实际上他们是第一批由内地到边疆的集体移民。

19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为加强军队质量,并减少军费支出,中央军委于1957年决定把军队现有的员额裁减1/3,并在两年内分期实现〔5〕。为安置复员军人并考虑到巩固边防的需要,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据此,1958年3至5月间,近10万名转业官兵分批进军黑龙江三江平原,到同年底,垦区农场发展到83个,有人口48万〔6〕。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比如移民到相关地区发展橡胶种植产业,又如弥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不足。垦荒移民的原因一般单独起作用,但也有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的。如军队转型,现役军人退伍转业完全可以有多种安置途径。之所以用新建军垦农场的方式来安置,主要也是因为农业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新建军垦农场可以大规模垦荒,迅速扩大耕地面积,有效增加粮食及工业原料的生产。

三、垦荒移民的组织与管理

集体移民是重大社会事务,工作复杂,要成功实施并非易事。中央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李富春在国家“一五”计划的说明中指出:“使用机器和其他办法进行开荒,有组织地移民耕种,这种办法因为工作复杂,规模较大,国家应该协同各地方统一地拟

〔1〕《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2〕《当代中国的新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747页。

〔3〕《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4〕《当代中国的新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748,750页。

〔5〕《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6〕《当代中国的黑龙江》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定具体方案,有领导地进行。”^{〔1〕}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这种经济体制不仅确立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全面干预,也形成了政府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依靠完整的政府组织机构开展移民工作,确保了移民工作的有序性。

集体移民的组织工作一般先是摸底调查的准备阶段,其次是宣传动员的布置阶段,接着是迁送、运输阶段,最后是迎接、安置阶段。1948年东北集体移民的组织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移民提供了重要的实施经验。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准备移民2万户,5万至6万人的指示,哈尔滨市在1947年11月开始着手移民的准备工作,通过调查访问,摸清了移民底数,同时与迁入地联系,议定迁移条件,并与铁路部门协调,安排好移民迁移的运输工作,随后召开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讨论移民对象、宣传内容、动员方式、各区任务及移民工作的组织机构等问题,接着成立市、区各级移民委员会,制定《移民暂行条例》《移民护送条例》《移民宣传纲领》,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移民登记,完成人员编组。移民的迁送有工作人员全程护送。护送工作从移民上车开始到全部安全移交当地县接收站为止,期间的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计划与安排。移民接受地一般都在移民来到时组织欢迎活动,并事先帮助解决了安家、生产等问题。尽管对移民的照顾由于安置地自身条件的差异而有不同,但总体上讲,移民对安置情况是较为满意的^{〔2〕}。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府对集体移民的组织工作更为成熟。比如1956年的垦荒移民,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移民应该是有组织的,由地少人多地区组织农村中特别是农业社中的剩余劳动力,携带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建立分社。最初去的只限于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春耕以前到达,一边生产,一边利用农闲时间修建过冬房舍。经过二三年的积累,然后迁移家属,正式与本社分开。往外移民的省区应在移民前几个月或一年,即派县区干部到计划移往的地区开展工作,先接洽安排好;然后再由区、乡干部带领移民前往,把劳动力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则更好。青年团在这方面起到了突击队的积极作用。接收移民的省区也根据情况提出分年分批接收计划,并在移入地区做好群众工作,依靠当地群众把移民安置好^{〔3〕}。有关省区据此进行了积极协调。黑龙江在移民计划确定后迅速召开了区县负责干部的移民垦荒工作会议,派出民政厅长等干部50余人前往山东重点移民县协助动员、审查、组织运输等工作。山东也派出民政厅副厅长等干部前往黑龙江协助安置移民。河南与青海就迁移与安置计划、动员对象、物资支援等内容定好协议书,浙江、河南等省委为动员支边成立

〔1〕 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2〕 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227页。

〔3〕 《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1955年5月,江苏省档案馆,3001—2—166。

了由第一书记或书记领导的专门委员会和办公室进行工作,并组织相互访问与参观^{〔1〕}。

政府组织的移民工作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社会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以形成移民光荣的思想意识。移民对象的确定要经过严格筛选,一个移民任务往往会有多个后备人选。江苏首批支边移民任务 16 000 人,而确定的报名人数在动员区往往占到适龄人数的 70%~80%^{〔2〕}。河南的移民动员提出了“五不要”(“地富反坏右”不要)“六不批”(现役军人爱人、孕妇、身体太弱、残废、有传染病、家庭脱离不开的)的规定,得到了农垦部的肯定^{〔3〕}。江苏的移民工作依靠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把动员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训练骨干,调查摸底,宣传发动,发动报名;目测,审查,批准定案;县社集中,准备启运。在移民人员运输时实行定组、定人、定车、定量和包数字、包质量、包时间、包安全的“四定”“四包”责任制,切实掌握运输情况,及时解决相关问题^{〔4〕}。

移民的迁送程序相当复杂,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为顺利完成移民迁送任务,各地成立了综合性工作机构,集中办公。江苏省成立的“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委员会”就是抽调劳动局、团省委、财政厅、民政厅、交通厅、南京铁路局、商业厅、宣传部等多部门人员组成。关于整个移民工作的组织领导,内务部提出,移民任务重的省可设立移民局或移民处,受省和内务部双重领导。安置任务重的省可在省人民委员会下设立移民垦荒局,除受省人民委员会领导外,在移民工作方面受内务部领导,垦荒工作受农垦部领导。为了密切有关部门配合还应组织移民委员会或移民垦荒委员会,移民局(处)和移民垦荒局成为它的办事机构^{〔5〕}。1950 年代末支边移民发动时,垦荒移民业务工作在中央由农垦部负责管理,内务部不再经管;在地方上由有关省、自治区党委双方直接协商进行^{〔6〕}。

历史上移民的安置是一种自然状态,即移民加入迁入地已有的经济体,或者成为迁入地的“拓荒者”,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体。1950 年代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成时期,因此垦荒移民一般安置于公有制经济组织内或者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如生产合作社等。不论是集体移民还是自流移民均是如此。黑龙江本着政府扶助与群众互助相

〔1〕《农垦部刘型副部长在全国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1958 年,江苏省档案馆,3086-2-1。

〔2〕《章维仁同志在省委第三次支边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9 年 7 月,江苏省档案馆,3086-2-3。

〔3〕《农垦部刘型副部长在全国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1958 年,江苏省档案馆,3086-2-1。

〔4〕《江苏省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迁送工作总结》,1959 年,江苏省档案馆,3086-2-5。

〔5〕《内务部关于移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6 年 7 月,天津市档案馆,53-2-1311。

〔6〕《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2 年 10 月,江苏省档案馆,3011-2-809。

结合的方针安置移民,1956年的省际农业集体移民建立新村431个,安置108126户,132383人;安插到社16179户,65409人;自办分社304户,1520人;其他安置479户,1207人^{〔1〕}。对自流人口的安置,黑龙江一是在有条件的地方仍以就地分散插队安置为主,二是通过建立新村,尤其是以老屯代建新村的方式来进行安置。1964—1965年,黑龙江牡丹江地区以前一种方式安置了10200人。后一种方式的规划是当年建新村136个,安置10193人^{〔2〕}。

跨区域集体垦荒移民面临病虫害传播风险。对此,农业部要求涉及移民的各省区严格进行检疫,防止农作物病虫害的传播。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在1956年要求凡可能携带移民区已发生的检疫性病虫及恶性杂草的种子、苗木(包括茎、块根、杂枝等)和农具,都应接受检疫检查和消毒处理,禁止移民将棉籽和其他农作物种子、苗木带往移民目的地。移民所需种子、苗木由移民目的地政府统一供应。移民所携带的农具、衣服、被褥及其他杂物等也必须做彻底的消毒处理,以清除潜藏的虫卵、病菌等。省级检疫站负责移民的检疫签证工作,实际工作由县的移民机关和农业部门、省检疫人员组成5人以上的检疫小组具体办理。

垦荒移民的检疫工作受到各移民省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新疆为防止棉红铃虫的传入,在大规模移民到来之前就通过农业部请求移民的湖北、安徽、江苏三省,将移民检疫列为移民准备工作的主要事项进行统一安排^{〔3〕}。正因为如此,大规模集体垦荒移民没有造成严重的病虫害传播。

四、垦荒移民工作中的问题与挑战

20世纪50年代垦荒移民的组织工作总体上是稳妥有序的,垦荒移民推动了土地开发,促进了生产,也稳定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首先是移民的巩固问题。集体移民的返迁问题一直存在,垦荒移民也不例外。1956年大规模移民迁送完成后不久就有相当数量移民返回原籍。以黑龙江最为严重,曾发生1万余人的骚动事件:集体请愿、包围政府、殴打干部、卧轨拦车,结果返回山东和流落全省各地约1800余人。甘肃、青海、内蒙古情况较好,但也返回原籍数百人。省内移民返籍现象以广东最为典型,当时就已有1700余人。未返籍的也有许多人不安^{〔4〕}。“大跃进”期间支边移民的返迁问题也很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有40余万人,约占当时迁移总数的30%左右^{〔5〕}。

〔1〕 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

〔2〕 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3〕 《农业部转告新疆电文希组织力量,做好移民检疫工作》,1959年2月,江苏省档案馆,3072-2-782。

〔4〕 《内务部关于移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6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53-2-1311。

〔5〕 《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2年10月,江苏省档案馆,3011-2-809。

造成移民返迁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移民为基层干部在动员时的夸大宣传所致,在发现垦区的实际情况后自然产生动摇;有的是因为移民原有房屋等财产不许出卖,在安置地借住房屋没有明确时间与租金,移民与房主均有意见;有的是因为安置在合作社的移民因无土地而怕秋后不能参加分红,生活困难,原社员也怕吃亏;有的是因为安置地区接收移民的任务偏重,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而致住房缺乏、设施简陋,生活不便;有的移民因到达垦荒地区较晚,开荒少,收入不足维持生活需要;还有一些移民是因为对安置地的生活环境不能适应,家属尚留在原籍等原因。

为巩固移民成果,农业部建议,移民原有房屋及土地上的作物、果树等财产(土地除外)应归移民自由处理,开出的荒地应归移民所有。政府有关部门则加强移民自力更生教育,帮助他们克服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防止宣传动员中的虚夸与片面性。移民任务较重的省、专区、县建立健全移民垦荒的专业机构,具体负责接送安置工作^{〔1〕}。

内务部专门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思想工作。安置移民较多的地区应把移民巩固列为中心工作。民政、移民、合作等相关部门应步骤一致,分工合作,主动解决移民存在的困难;注意克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以及厌倦和畏难思想,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多教办法,多予鼓励,使他们能够胜任工作。针对解决了移民安置的一般生活问题后少数移民仍然存在的生活困难,内务部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必须加强对移民生产的领导,做好移民家属的接送和安置;当前应调配与组织好劳动力,保证秋收,说服移民努力完成副业生产计划,并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定期及时分红,以鼓舞移民生产建家的信心,切实解决移民生活困难。

在进一步的指示中,内务部强调,移民巩固的关键“是大力组织移民搞好农副业生产”,保证“移民的收入达到或超过移出地区的水平”。为此,“必须根据因地、因社制宜的原则,开展多种经营”^{〔2〕}。《光明日报》就此发表社论,提出“帮助移民生产建家”。文章指出,领导移民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当前移民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关心移民的困难,尽可能帮助解决问题,任何对移民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必须切实防止和纠正^{〔3〕}。

总结组织集体移民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要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对移民,全面而切实地介绍移往地区生产和生活情况,在此基础上启发其自觉自愿;对移入区原居民进行思想教育,使其正确对待移民。二是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和支援,事先选定开荒地点,安置移民,供应粮食,及时发放贷款,组织车辆运输,医治移民疾病,使移民安心生产。三是对不安心和不适合农业生产的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处理。坚决要

〔1〕《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41 页。

〔2〕《内务部关于继续做好移民巩固工作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 年 1 月—6 月)》,法律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04 页。

〔3〕《帮助移民生产建家》,《光明日报》,1956 年 10 月 10 日。

求返乡而又可以回去的应当允许;知识分子要求升学或就业而又确有可能的,应当允许;技术工人应当另行介绍就业,手工业工人应当组织起来,在垦区从事手工业生产,为移民服务;其他特殊情况如残疾、病人原来就移出不当的,应当送回原籍〔1〕。

其次是移民工作中出现的浪费问题。关于移民经费,中央农村工作部核算开荒及移民的路费每亩约合7元左右,需国家投资。牲畜、农具购置费及其他补助每亩约合10元左右,可用贷款解决。为节省经费,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在地多人少的地区,一般农村都是缺少劳动力的,耕作比较粗放,而且村子周围都有荒地可以开垦。这种地方应该尽量吸收外来的移民。无论是有组织的移民,或是零星移民,都可以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当地劳力不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内,作为这些合作社的社员。这样做既可以解决这些农业社劳动力不足,重新耕种撂荒地,并可有助于改变当地粗放的耕作习惯,改进技术,提高产量;也不必为这些移民置备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从而节省国家的投资。这些移民当年的口粮可借吃当地义仓粮,或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政府预借,收获以后归还。移民所需房屋可利用农闲时间修盖,所需费用可由自己的劳动收入和农业贷款或信用合作社贷款解决,国家也可予以必要的补助〔2〕。

农村工作部的基本主张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好移民工作。但是,实际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相当严重。一些干部在思想上认为移民事业只有国家多拿钱才能办好,不懂得注重发挥移民本身和社会的力量。国家开支的移民事业费逐年增多,经费项目和指标较普遍地存在着偏宽、偏高的现象。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存在“等、靠、要”思想,不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不爱护公物,造成许多财物的损坏和丢失,在生活开支上缺乏计划,没有长远打算,铺张浪费严重〔3〕。

部分地区因勘察设计粗疏、规划不当而造成的损失浪费更大。比如青海的32个青年农场就没有进行认真勘察规划,建场后因海拔高、水源短缺而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国家对该省新建农场投资1亿多元,调粮4625万千克,而移民三年仅产粮1750多万千克,产值只有1800万元,可谓得不偿失,最后农场全部撤销,把支边人员送回原籍。甘肃甘南地区的情况与青海类似,大部分新建农场最后撤掉。张掖地区因粮荒严重,不得不把25000多支边人员调往新疆、山西就食〔4〕。

为遏制浪费问题,内务部专门发布指示,要求结合当前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在移民事业上开展一场深入的反浪费斗争。从揭发各种浪费的具体问题入手,深入检查领

〔1〕《内务部关于移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6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53-2-1311。

〔2〕《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1955年5月,江苏省档案馆,3001-2-166。

〔3〕《内务部关于反对浪费勤俭办移民事业的指示》,1958年3月,天津市档案馆,65-1-233。

〔4〕《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2年10月,江苏省档案馆,3011-2-809。

导思想与作风,批判干部中的“官办”移民思想和移民中的单纯依靠政府的心理;充分挖掘移民的经济潜力,使之积极投入垦区的建家生产,发挥广大群众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互助力量,支援移民垦荒工作;切实记取因勘察设计不当造成的损失,开展全面的经济调查,务求移民规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内务部明确,国家对移民经费的开支属于扶助性质,今后仍应采取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两个办法来解决。在国家支出方面,应本着移民困难大的、安置地区经济条件较差、距离较远的多资助,反之则少资助的原则进行合理安排^{〔1〕}。

再次是移民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移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对集体移民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干部的表率作用对坚定移民扎根边远地区的决心十分重要。但是,在1950年代的垦荒移民工作中,不少干部存在工作作风问题,给移民工作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956年青海的天津移民工作中,个别乡社干部作风简单生硬,对移民的一些思想问题不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而是威胁(动手要打)、讽刺^{〔2〕}。江苏在1959年支边移民时,个别地方和极少数基层单位在宣传动员和政策掌握上没有认真执行省委指示,工作粗糙、不深入,甚至有个别欺骗行为出现,答应移民进疆后都参加工业生产,因而个别地方(扬中、滨海两地)的支边青壮年因没有达到个人愿望,发生了闹事现象。一些地方审查移民条件不严,有精神疾病、严重慢性病的青壮年和少数十三四岁的孩子也移民进疆^{〔3〕}。

农垦部指出,在管理教育工作上,有些负责移民工作的基层领导干部不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作风简单粗暴,对支边人员动辄批判斗争,乱扣政治帽子,甚至发生了随意开除党籍、团籍,非法行刑、逮捕等违法乱纪行为,严重伤害了群众感情。几年来在移民工作中,因一些管理干部的违法乱纪和工伤事故等原因,造成移民非正常死亡的有6700多人^{〔4〕}。

最后是移民与移入地原有居民的关系问题。1956年青海的天津移民,从互助、贵德两县中小学来看,两地学生不团结的现象较为严重。教员认为同学间的打架是学生间的互相教育。因此,当学生打架时教师不仅不动阻,反而就此评论说“天津市人打不过青海人”。有的教师歧视移民,甚至不解答移民学生的询问。学校服务员不准天津学生打热水,天津人的生活习惯也受到当地居民的嘲笑。个别供销社干部卖给移民的东西较当地人贵五分,当移民质问时售货员竟说:“我们不是为你们(移民)服务的”,由此

〔1〕《内务部关于反对浪费勤俭办移民事业的指示》,1958年3月,天津市档案馆,65-1-233。

〔2〕《关于慰问天津市赴青海移民的情况报告》,1956年5月,天津市档案馆,53-2-1311。

〔3〕《关于慰问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青壮年工作的报告》,1959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3072-2-784。

〔4〕《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2年10月,江苏省档案馆,3011-2-809。

在移民中造成很坏影响〔1〕。

垦荒移民的安置需要一定的物资准备。由于必要的物资准备不足,一些安置在人民公社的支边人员所需生产生活资料几乎全部是平调当地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当地群众对此颇有意见。青海省循化县在班禅喇嘛的出生地文都采取了撵走当地藏民,侵占他们的村庄、牧场和耕地的办法建立青年农场。甘南地区夏河、临潭等县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这严重违反了民族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后来虽进行了调整、退赔,但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才能挽回。新疆在少数民族人民公社安置的支边人员,彼此语言不通,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不同,加上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影响到民族团结〔2〕。

注意到移民工作中的民族团结问题,内务部就此提出,要防止和纠正大汉族主义思想,不要因为移民垦荒而侵犯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如牧场、水源等);要把少数民族移民安置在适应他们生活习惯的地方,并注意解决他们的特殊需要(如回民的清真寺、墓地等)。对于杂居在各省的回民如果符合移民条件应与汉族民众一同动员,不要专门动员回民以免引起他们的误会〔3〕。

为解决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团结等问题,农垦部主张彻底解决退赔问题。在安置地区应本着自愿互利与等价交换的原则,妥善解决移民与当地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特别是侵占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资料更应由地方彻底退赔清楚。对受过批判和处分的移民和随迁干部,应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即使他们已返回原籍,原安置单位仍应负责做出结论,向原籍地党委、政府和本人交代清楚。对已死亡的移民,应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以安置地区为主,移出地区协助,彻底进行调查处理,逐人逐件地向其家属做出交代,做好抚恤工作。同时,认真解决移民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安置好返籍的支边人员。农垦部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移民中的民族团结问题在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逐步解决。

垦荒移民工作中无论是大批移民的返籍,还是移民与原有居民的冲突等问题都是局部的工作性失误,而非全局性政策错误,因而并不能成为否定垦荒移民的理由。移民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后来也得到全部或部分的纠正。总的来讲,垦荒移民对我国扩大耕地面积,加快边远落后地区的开发是有贡献的,其历史意义更在于探索了边疆开发的国家动员模式,为后续三线建设提供了制度原型。当然,垦荒移民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实践,其经验教训也为当代人口流动管理提供了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刘一兵]

〔1〕《关于慰问天津市赴青海移民的情况报告》,1956年5月,天津市档案馆,53-2-1311。

〔2〕《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 and 今后意见的报告》,1962年10月,江苏省档案馆,3011-2-809。

〔3〕《内务部关于移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6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53-2-1311。

Editions and Reception of Caigentan in Korea: Tracing Textual Genealog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East Asia

Ahn Dae-hoe

Keywords: Caigentan; Manhan Hebiben; Qingkanben; Wakokubon; Joseon book history; East Asian bibliography; intellectual recep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extual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reception of Caigentan (The Book of Efficacious Roots) in Korea through the lens of East Asian bibliographic exchange. By reconstructing author Hong Zicheng's merchant-family background in Huizhou—a Ming-Qing commercial hub—and his mentorship under Wang Daokun, it reveals how the text's pragmatic mercantile ethos reflects its creator's socio-economic origins. The analysis delineates the evolution of Caigentan editions, tracing textual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earliest woodblock print (Qingtanben), the Qing-era imperial bilingual edition (Qingkanben), and the Korean woodblock reprint (Wakokubon), while highlighting the state-commissioned Manhan Hebiben (Manchu-Han Bilingual Edition) as a hybrid of Confucian maxims and administrative terminology. Documenting Yi Jun-hui's 1750s acquisition of the Manhan Hebiben in Beijing, th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scribal copies of its Chinese text circulated among Joseon's literati-merchants, evolving into a canonical text for ethical self-cultivation. The 1917 publication of Han Yong'un's Jingxuan Jiangyi Caigentan institutionalized the Qingkanben-based edition in modern Korean education, whereas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s rooted in the Wakokubon reveal persistent textual ambiguities in over 200 extant editions. By synthesizing paleographic evidence with sociopolitical analysis, this research elucidates how Caigentan's semantic flexibility and material circulation mirrored Korea's shifting geopolitical identities from the late Joseon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underscoring its role as a vector of Sino-Korean intellectual exchange.

Threshold as Media: The Mediated Existence and Contemporary Reconfigu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atial Symbols

FU Rong CAI Ling

Keywords: threshold; spatial symbols; medi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reconfiguration

Abstract: As a threshold compon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menkao (threshold) constitutes a critical element of domestic spatial ethics, simultaneously embodying feudal hierarchical order and harboring cultural aspirations for familial harmony. Spanning millennia, its functional and semantic evolution reveals a dual trajectory: the metaphorical mediation of threshold boundaries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practices demonstrate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is architectural element, as "threshold thinking" inspires innovative reinterpretations of traditional spatial symbolism, generating distinct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he digital age, reconciling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necessitates recontextualizing material ritual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s through an era-specific lens, thereby advancing the contemporary reconfiguration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legacy.

China's Reclamation-Induced Migrants in the 1950s

ZHAO Ru-kun

Keywords: reclamation immigrants; planned economy; population mobility

Abstract: The reclam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1950s emerged as a produc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Its motivation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key aspects: first, the urgent need to address post-disaster resettlement and urban unemployment; seco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meet developmental demands; third, reconcil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the national in-

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and fourth, integrating military demobilization with border security objectives. These migrants constituted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While spontaneous settlers did exist during this period, state—organized collective reclamation projects involved far greater number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the government enforced orderly management of collective migrants. Nevertheless, challenges arose in 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return migration within collective groups, in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during relocation, inconsistent work ethics among officials, and localized tensions between migrants and residents. These issues reflected operational inefficiencies rather than systemic policy flaws. Ultimately, reclamation migrant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expanding arable land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mote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Policy Preference, Development Imbalance, and the Dilemma of the US Dollar's International Status

DUAN Shi-de

Keywords: Bretton Woods system; paper gold; fiscal expansi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monetary rebalancing

Abstract: The US dollar, leveraging its economic strength and sound creditworthiness, attained the status of "paper gold" i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becoming a cornerstone of U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st-World War II, the US overextended its fiscal capacity to expand spending, which not only triggered economic imbalances but also generat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he dollar's global standing. Although the unilateral termination of dollar-gold convertibility temporarily mitigated liquidity crises, the erosion of international trust intensified systemic vulnerabilities. Consequentl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ransitioned into a multi-currency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dollar's trajectory,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a pivotal element in the ongoing monetary rebalancing—requires foundational reforms. Strengthening domestic economic resilience, enhancing national creditworthiness, and pursuing stab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fortify the RMB's competitiveness and facilitate its progressive global integration.

Re-examining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Human-Industrial Dynamics in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Era

LU Jun-jie ZHAO Ru-yu

Key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human-industrial dynamics; intelligent automation; labor market transition; policy innov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reinterprets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decline through the lens of human-industrial dynamics during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dentifying three interlinked pathways of change. Firstly, the displacement of labor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now outpaces absorption, eroding the "quantity advantage" as automation reduces demand for traditional manual workforces. Secondly, the industrial system's evolving requirements—from physical labor to neuro-cognitive adaptability—relax age-related constraints, prioritizing skills over chronological "age-appropriateness." Thirdly, income distribution shifts from time-based exploitation to knowledge/skill capital ownership, invalidating "low-cost labor efficiency." To navigate this transition, the authors advocate a dual-policy framework: transitioning demographic strategies from quantity-centric planning to quality-driven STEM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ecosystems, while fostering inclusive growth through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social consumption enhancement. This recalibration aims to redefine human capital valuation beyond demographic arithmetic, ensuring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in an era where industrial evolution hinges on human creativity rather than demographic arithmetic.